

驯鹿鄂温克人生态移民的民族学考察

祁惠君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驯鹿鄂温克人生活于大兴安岭西北部林区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是我国惟一饲养驯鹿的族群。2003年政府实施生态移民政策,将他们整体搬迁到市郊“定居”。然而,处于半野生状态的驯鹿,现阶段还不能适应圈养和舍饲,于是驯鹿和饲养驯鹿的主人们重返森林,继续着他们千百年来生产生活方式。“定而不居”现象的存在,反映了政府实施生态移民存在的问题。要实现驯鹿鄂温克人完全意义上的定居、实现驯鹿的自然放养、实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敖鲁古雅;驯鹿鄂温克人;生态移民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873(2006)01-0098-08

“驯鹿鄂温克人”是指中国鄂温克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生活于大兴安岭西北部林区,尤以内蒙古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素有“驯鹿之乡”的美称)为典型代表。目前,他们是我国惟一饲养驯鹿的族群。

2005年7—8月间我们深入到驯鹿鄂温克人迁移的新地址——新敖鲁古雅乡,针对2003年的生态移民及其效果进行调研。

新敖鲁古雅乡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西南4公里处,地处得耳布尔、金河、好里堡三镇交汇点,S301国道贯穿全境,交通便利。全乡行政区划面积为1767.2平方公里,总户数445户,总人口1390人,由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蒙古族、满族、回族、俄罗斯族和汉族等8个民族组

成,少数民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25%,其中鄂温克族234人,占全乡总人口的16.8%。随着乡规模的扩大,该乡也从以驯鹿鄂温克人为主体的单一民族社会,变成了外来人口超过驯鹿鄂温克人人口的多民族社会。

一、驯鹿鄂温克人“定居”的追述

根据考古学的研究,鄂温克人的先民早在公元前数千年就已经生息在今贝加尔湖沿岸和黑龙江中上游广大地区,他们信仰原始的萨满教,以狩猎、渔捞、采集和放养驯鹿为生。从16世纪开始,沙俄向东扩张领土,用武力征服当地少数民族,推行俄罗斯化政策,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亚洲东北

收稿日期:2005-12-10

作者简介:祁惠君(1960-),女(蒙古族),内蒙古呼伦贝尔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北方民族文化研究。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有鄂温克族人口30505人,其中有26201人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有2706人分布在黑龙江省。其余散居在广东省的有249人,辽宁省221人,北京市164人,河北省127人,山东省107人。见杨圣敏主编:《中国民族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85页。

现在的媒体笼统地说鄂温克猎人,这不能完全代表鄂温克人的声音。鄂温克人的主体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猎人,234个鄂温克族人可以分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成年人又可以分为猎人、干部和妇女等等。驯鹿鄂温克人是一个整体,民族学考察,应该考虑到主体内部的层次性。

部的政治地理分布,而且也改变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历史。在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的先后统治下,种种来自外部的强制性力量,事实上使驯鹿鄂温克人的社会不可能遵循其自身的轨迹正常发展,鄂温克猎民社会因此也始终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

《清太宗实录》记载:“索伦别部”,即使鹿鄂温克人,有12个大氏族,约有1500—2000人,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大的部落。^{[1](P466~467)}1654年迫于战乱和俄罗斯人的压力,使鹿鄂温克人迁徙进入大兴安岭地区。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动,其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根据《尼布楚条约》的边界卡伦与巡查制度规定,驯鹿鄂温克人不能自由地往来于两国之间。当时,这个群体大约由170人构成,分7个氏族。他们按照古老的习惯,形成了有较明确界限的相对稳定的猎场,猎场基本上以“乌力楞”公社为单位集体占有和使用。到20世纪末,驯鹿鄂温克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大体上是在北纬51°15′—53°15′和东经120°5′—123°35′之间。这里属于北方寒温带气候,是中国最冷的地方之一,也是中国少有的“永冻土层”地带。

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学调查显示,鄂温克猎民的生活丰富而复杂,其中既有来自远古的积淀,也有对异文化介入的容纳,更有在保持自身传统的同时为适应外部环境而做的种种努力。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普遍的观点认为:鄂温克猎民的生产方式仍处在原始社会形态。政府为了让他们的“原始民族”变为社会主义民族,再进入现代社会,所采取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积极措施就是让鄂温克猎民“定居”。

20世纪50—60年代,驯鹿鄂温克人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受到国家政策的特殊保护,配备有较好的枪支,子弹供给充足,狩猎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政府为了促进交换,于1954年在奇乾成立了供销社,终结了长期以来建立在个人、家庭基础上的与安达的交换关系,首先从经济活动开始将他们纳入到了国家的行政管理之中。驯鹿鄂温克人的猎区也转移到阿龙山一带。

(一)第一次定居

1957年,政府在奇乾建立了民族乡。首先有8户猎民在奇乾被安排定居。一些较早受政府教育的人成为了乡干部,干部因工作需要逐渐地开始定居。另外,政府为了让他们从“原始民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族”,所采取的惟一的方法是使其接受教育。干部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小孩和年轻人要接受学校教育。这是当时的政治任务,也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对于没有文字的驯鹿鄂温克人来说,当时采用的是汉语教育。尽管这项工作进行得非常困难,但是毕竟有几个驯鹿鄂温克人的孩子离开森林来到城市(海拉尔),甚至到首都北京上学去了。

1959年政府拨专款在奇乾附近的乌苏龙修建了三十多间“木刻楞”房。1960年春有四十余户猎民搬迁到乌苏龙的木刻楞房里,同年秋又有18户猎民定居。1962年又有13户猎民定居。1964年,政府将猎民迁到根河市附近的阿龙山,但鄂温克人不愿住在阿龙山,于是又决定在满归附近的敖鲁古雅为他们建乡。

(二)第二次定居

1965年9月1日三十多户猎民全部搬迁到离满归林业局不远的敖鲁古雅河与激流河交汇的地方,同年10月8日政府在敖鲁古雅正式建立民族乡。该乡地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距离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县约100公里。鄂温克猎民仍然保留着狩猎、放牧驯鹿的生产、生活方式,故有“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之称。当时新建两户一栋的木刻楞房,有40户169人搬进了新居。

1980至1983年政府把全部木刻楞房翻建为砖瓦结构的房屋。但大部分猎民在“定居”之后,又返回山林,出现了定而不居、多次反复的现象。

1984年,驯鹿承包给了个人,但所有权还是没有给猎民。对于一部分驯鹿鄂温克人来说,驯鹿茸的收入成了其主要的经济来源。

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不断扩大,给驯鹿鄂温克人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变化因素。比如:从小

“这种‘原始社会末期说’即使有一定的依据,也多少忽视了其社会文化长期以来剧烈变迁乃至变异的某些基本事实;即使‘原始社会末期说’成立,那也必须强调其非原生亦即次生社会形态的属性。因为在多种外来文化因素和异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其社会组织与文化结构已经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见周星著《民族学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48页。

城镇的小饭馆到北京、上海的大饭店,对野味的需求急剧上升,因此偷猎野生动物的活动十分猖獗,再加上长期的乱砍乱伐,森林生态破坏日益加剧,驯鹿鄂温克人的传统狩猎对象——犴、马鹿等在当地已经基本绝迹。那么依靠传统经济生活的驯鹿鄂温克人,惟一的收入便是驯鹿茸。实际上很多时候,由于驯鹿少或因自然灾害、人为因素等丢失了驯鹿,就只能依靠政府的救济生活。

下面我们从移动与定居和生活方式的传统与现代进行分析归类:

	A类	B类	C类
居住形式	以移动为主	半移动半定居	定居
经济来源	驯鹿茸	工资等其他劳动收入	政府救济款等
生活方式	传统	现代化	现代化

所谓以移动为主的居住形式主要是承包驯鹿的年龄较大的人,他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放鹿点上生活,冬天的2—3个月或有病时才回到民族乡居住;半移动半定居的居住形式主要是承包驯鹿的中青年人,他们来往于放鹿点和民族乡之间,但生活的中心是在民族乡。

所谓传统生活方式,这里强调的是以森林作为主要的生活空间,以驯鹿为伴,仍然保留有较多民族特点的生活方式;现代化的生活主要是指和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基本一致的生活方式。

现在虽然驯鹿鄂温克人绝大多数都过着现代化的生活,但是留恋传统生活的人尽管少但依然存在。老猎人们已相继去世,支撑放养驯鹿的一代人越来越少,而年轻人中不想或不适应在上山放养驯鹿的人越来越多;文化代沟现象日益深化,酗酒现象蔓延。在此我们强调,驯鹿鄂温克人正以自己的方式,容纳、吸收、选择、抗拒,尽可能地对应和适应着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新的生活方式的吸收,新的文化的产生,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二、生态移民的主要观点、过程及相关的经济数字

“生态移民”一词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在现实社会中除生态的层面以外,生态移民还伴随着多种多样的因素,以错综复杂的形式存在。以

敖鲁古雅的移民为例,可以归类到以扶贫为目的而进行的生态移民。另外生态移民对生产、生活以及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一)政府实施生态移民的主要观点和过程

2001年根河市委、市政府决定对鄂温克民族乡实施整体生态移民,这也是驯鹿鄂温克人近50年来的第三次定居。政府实施生态移民主要观点如下:

1. 生产生活方面

驯鹿总头数多年徘徊在800头左右,并近亲繁殖,驯鹿种群质量下降。猎民处于靠天养畜的状态,管理粗放。“天保工程”实施以来,根河市也实行禁猎政策,传统的狩猎生产难以维系。2001年猎民年均收入不足1000元。

2. 生态环境方面

1965年建立的敖鲁古雅民族乡,位于激流河与敖鲁古雅河交汇处,由于生态环境恶化,河流改道,河床侵蚀严重,每年汛期水灾频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威胁。

3.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防洪大堤年久失修;供电线路老化;乡政府办公楼冻裂变形,已经成为危楼;学校、博物馆、文化馆、卫生院都年久失修。以上几项工程维修建设需要资金2000万元。

4.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面

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金融机构转为商业银行后撤出该乡,开支、取款、存款等极其不方便。邮电业务萎缩,通讯设施落后。

5. 猎民通婚范围狭小,不利于人口发展

2003年有猎民232人,由于交通不便,对外联系较少,通婚遇到困难,至今仍然有很多20~40多岁的鄂温克族男人未婚。

实施整体生态移民的项目得到内蒙古计委的支持,并下发了内计赈字(2001)1080号文件《关于对根河市2001年生态移民和易地扶贫移民试点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和内计赈字(2002)1246号文件《关于根河市调整2001年生态移民和易地扶贫移民试点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最终项目总投资980万元,国家一次性补助510万元,地方自筹资金470万元。

生态移民工程于2002年7月开工建设,2003年7月竣工,总投资1600万元,其中国债资金

510万元,其余为地方自筹。工程建设包括:住宅 31栋 62户,每户 50平方米,内设卫生间、暖气、自来水等设施,全部实行集中供热、供水;鹿舍 48个,每个 350平方米;办公楼 800平方米;博物馆 1229平方米;鹿产品加工厂房 560平方米;柏油路 2400延长米。

2003年 8月 10日搬迁工作开始,至 9月 18日结束,并举行了隆重的搬迁庆典活动。

(二)政府相关的经济数字

此次整体生态移民项目作为中国政府生态移民和易地扶贫移民试点工程,得到了新闻媒体等多方关注。移民后政府采取了如下积极的措施:

1. 发放补助款

2003年整体迁移后,为每户发放了 300元生活补助费,无偿提供了液化气灶具和小灵通手机。动员社会力量,采用一对一帮扶形式,为每户解决了电视机、电视柜、床和沙发等家用设施。

2. 猎民的收入

2003年移民前猎民的收入情况

户数:62户,人口:154人。

(1)享受低保人员:75人,每人每月金额为 100元,全年总额 90000元;

(2)护林工资:25人,每人每月 36元,全年金额 432元,全年总额 10800元;

(3)工资收入:5人,每人每月 800元,全年金额 9600元,全年总额 48000元;

(4)鹿茸收入:鹿茸产量 150公斤,每公斤平均价格为 500元,共计总收入 75000元;

(5)狩猎收入:62户,每户 1000元,共计总收入 62000元。

总计:285799元,人均:1855元。

2004年移民后猎民的收入情况

(1)享受低保人员:75人,每人每月金额 100元,年底每人增加两个月低保金 200元,全部总额为 105000元;

(2)护林工资:25人,每人每月 36元,全年金额 432元,全部总额为 10800元;

(3)工资收入:5人,每人每月 800元,全年金额 9600元,全部总额为 4800元;

(4)鹿茸收入:鹿茸总产量 150公斤,每公斤平均价格 500元,共计总收入 75000元;

(5)62户猎民享受免费供水(每户每月水费

10元)、供暖(每户每月取暖费 200元);

(6)为猎民安置了 38个公益岗位,每人月工资 200元;

(7)解决安排猎民及家属就业 8人,每人月平均工资 400元;

(8)根河市民政局为每户猎民发放 1000元煤炭粮油补助;

(9)为鼓励猎民养狐,平均为每户猎民支出 5180元的种狐款,现在有 16户猎民购买了种狐。

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62户猎民 2004年全年收入总计是 608840元人民币,猎民人均收入为 3953元。上级有关部门在低保、煤炭、粮油、取暖费、水费、护林工资等方面全年补助金额总计为 407440元,人均 2645元。除掉全年上级补助的金额,猎民纯收入总计 201400元,人均 1307元。尽管政府下了很大力气,但是与 2003年比较,猎民失去了狩猎收入,仅此一项,平均每人少收入 548元。

事实上,到 2005年 8月,“定而不居”的现象依然存在。因为现阶段驯鹿还不能适应圈养和舍饲,而作为驯鹿的主人,驯鹿鄂温克人再一次无奈地跟着驯鹿回到了森林,继续着他们千百年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此次整体生态移民项目反映了政府相关措施实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实现驯鹿鄂温克人完全意义上的定居、实现驯鹿的自然放养、实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三、典型案例

(一)个案一——巴拉杰依一家

巴拉杰依一家在驯鹿鄂温克人中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家庭。笔者 1986年夏季到敖鲁古雅民族乡时,就住在巴拉杰依家里。

巴拉杰依,女,1942年 5月生。她的母亲纽拉曾是驯鹿鄂温克人最后一位萨满。她的丈夫是最早接受政府教育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参加工作的驯鹿鄂温克人之一,她本人也是最早参加工作的驯鹿鄂温克妇女之一。她的大女儿柳芭是全国恢复高考后最先考上大学的驯鹿鄂温克人大学生。

巴拉杰依是在森林中的撮罗子里出生的。直到7岁,即1949年3月,她才第一次走出森林,那一次她和大人们一起将冬天打的灰鼠皮运到奇乾以换取粮食和盐等生活用品。

1953年政府将巴拉杰依送下山,进入学校学习。当时是在奇乾小学。毕业后,巴拉杰依先是当了卫生所的清洁工,后来又学了护理。当时驯鹿鄂温克人出身的护士只有两个。

1986年,巴拉杰依不想继续留在乡里工作,于是办理了退休,上山承包了二十余头驯鹿,过起了与驯鹿为伴的猎民生活。现在在山上与她一起生活的还有她的小女儿柳夏和大儿子维佳。维佳现在已四十多岁,仍然单身。维佳曾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进修过,在乡政府曾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但由于嗜酒,不能安心在乡政府工作,更主要是由于他依然留恋森林,于是在1988年毅然上山与母亲一起过起了放牧驯鹿的生活。

19年后,当笔者再次来到敖鲁古雅乡时,巴拉杰依刚刚下山,住在山下的家里。它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还在距离新敖鲁古雅乡200公里处的一个驯鹿放牧点管理着六十多头驯鹿。她高兴地告诉笔者:“今年新添了十多头小仔鹿。”由此可见,定而不居——在新敖鲁古雅乡和放牧点之间不断转换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依然是部分驯鹿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

当下,驯鹿鄂温克人正生活于主流文化和自己的民族文化之间,巴拉杰依的大女儿柳芭的个人经历是一个极其生动的个案。《神鹿啊,神鹿》是1997年拍摄的以柳芭为主人公的纪录片,曾获得德国柏林电视节大奖、上海国际电视节大奖。

柳芭,1960年生,1981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1985年分配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当美术编辑。一个人在都市生活,缺少朋友,文化上不被认同,她感到极其孤单,于是开始酗酒。1992年她也毅然回到了山林。由于和驯鹿生活在一起,她有了创作的源泉,她开始写生、作画,并创造出独特的“皮画”艺术。几年前柳芭去世。巴拉杰依老人见到笔者时特别高兴,她将柳芭生前画的画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让我们拍照。很多画都有柳芭的签名,有些画的背面还写有短诗,反映了柳芭当时孤独和痛苦的心境,这种心境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

巴拉杰依本人曾走出森林,她的儿女们也曾走出森林,但最后又都选择了回归森林,文化的变迁与调适、现代和传统在她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巴拉杰依还有一个孙子和两个外孙女。孙子在新敖鲁古雅乡上学,一个外孙女得到爱心捐助被送到江苏省上寄宿制学校。柳芭的女儿则跟着父亲——一个四川汉族人,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生活。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主流文化的教育,今后会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呢?

(二)个案二——达娃一家

我们的访谈中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叫达娃,40岁,女主人叫郭芳,达斡尔族,35岁。他们家有三十多头驯鹿,放牧点在距离新敖鲁古雅乡一百余公里处的阿龙山、金河一带。男女主人长期在驯鹿放牧点生活,而他们的孩子却生活在山下。他们的女儿14岁,在根河市一中上学;儿子11岁,在敖鲁古雅乡小学上学。虽然孩子上学方便了,但他们的日常生活却必须托人照管。

这户家庭已经迁入新家一年多了,但女主人却表示她很无奈,不愿意搬迁。新房只有50平方米,过于狭小,她为此感到很压抑。于是她自己花钱另接出一间厨房,而把新房中的厨房腾出来装修后给儿子住,这样扩大了新房的面积。他们夫妻是因为改造装修新房才从山上回来的。由于新敖鲁古雅乡没有放养驯鹿的场地,他们必须在改造装修新房完工后再回到山上。现在他们是临时雇人帮忙在放牧点放牧和饲养自己的驯鹿。

总之,从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鄂温克猎民70%的家庭已经是异民族通婚,有很多异族人,通过当“女婿”和“媳妇”进入驯鹿鄂温克人的社会。

另外,1965年建成敖鲁古雅民族乡后,表面上和形式上是“定居”了,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鄂温克猎人并没有定居。真正定居的只是老人和孩子,父母与孩子第一次被分开了。政府让这些孩子们免费上学,接受主流文化的教育。受主流文化的影响,他们现在更喜欢城市生活,已经不适应山上的生活了。由此关于“猎人”这个概念已经出现了断层。

现实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是这种活生生的现实却很少能在当下的民族志中得到反映。

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各民族的时代气息呢?比如,驯鹿鄂温克人中也有在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也有人离开了民族乡选择到外地居住。在此我们必须强调主体的多元化现象是非常显著的。社会结构也日趋复杂化了。现在有想在森林中度过一生的驯鹿鄂温克人,也有想在城市里生活的驯鹿鄂温克人。我们不能说前者代表驯鹿鄂温克人的生活,后者就不代表驯鹿鄂温克人的生活。当然,敖鲁古雅驯鹿鄂温克人的前途在于逐渐融入现代社会,从而既发展和发扬了驯鹿产业与民族文化特长,又形成与主流社会在结构上的互补关系。这与前苏联驯鹿民族萨阿米人的情形有许多相似之处,^{[2](P13)}可能将是一个伴随着尴尬与痛苦的较长的探索过程。

四、移民后的政府:尴尬、苦恼与新的探索

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把放养驯鹿继续维持下去?这一经济形式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驯鹿是属于北寒带的动物。有野生(分布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西北部极地,当地少数民族称之为 caribou)和饲养(主要分布于俄罗斯、芬兰等国家)两种。据统计,世界上驯鹿总数有500万头。大体上说,大兴安岭是驯鹿分布的南限。这里的植物构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高层植物主要有兴安落叶松、白桦树和樟子松等;中层植物主要是一些灌木类;下层植物主要有苔藓类和当地叫做“塔头”的一种草本植物等等。

(一)圈养驯鹿的“试验”

目前,大兴安岭西北麓是我国惟一放养驯鹿的区域,也是世界上驯鹿分布纬度最低的地区。从生态学的角度看,鄂温克人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保持和坚持放养驯鹿,并取得成功,这与他们对驯鹿的喜爱、对环境的认识和不断地适应是分不开的。

早在传说的勒拿河时代,驯鹿就与鄂温克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了。驯鹿俗称“四不象”,头似马非马,角似鹿非鹿,身似驴非驴,蹄似牛非牛。驯鹿是一种耐寒动物,喜冷怕热,适宜生活在气候严寒的针叶林或针阔叶混交林带。驯鹿主要吃苔

藓类植物,也吃灌木的嫩枝、嫩叶,但是最爱吃的还是苔藓和蘑菇。由驯鹿的习性所使然,搬迁成了猎民生活的主旋律。

在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的驯鹿放养史上,曾有过数次因疥癣症等疾病使驯鹿几乎灭绝的事情发生。每年6—9月份,驯鹿发病率最高,主要有结合性肺炎、脑炎、关节炎、风湿病和角蛆等,其中结合性肺炎也是猎民与驯鹿交互感染共患的传染病。加上白害(雪灾)、狼害、种群过小及退化趋向等原因,驯鹿繁衍始终受到自然生态环境的遏阻。为维持驯鹿的生存、繁衍和发展,猎民们只好十分频繁地搬迁以使驯鹿不断有新的食物供给。搬迁有大小之分,驯鹿走两天以上的路程即为大搬迁。夏秋季节的一处营地最多只住10~20天;冬春季节2—4天即搬迁一次。搬迁遵循一定的往返路线和季节规律,除变换猎场外,为驯鹿寻找新牧场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驯鹿性情温顺,喜欢群聚,一群可达数百头,平时无圈栏管理,只在4—5月份母鹿产仔期或9—10月发情交配期,才使用圈栏管理。必要时须对仔鹿人工哺乳5—6个月,对多奶的母鹿,妇女们每日都要挤奶一次。一般是在每年的5—10月,对缺乏蔬菜的猎民而言,驯鹿奶是重要的维生素来源。通常是将鹿奶兑入红茶饮用。

驯鹿与猎民和谐共处,相依为命。每一头驯鹿都有自己的名字。驯鹿颈下多系铜铃,便于失散时寻找。驯鹿为避蚊虻叮咬,常到猎民篝火周围聚集。驯鹿还喜欢尿碱和盐。猎民拢烟或敲击盐袋,驯鹿召之即来,纵之即去,自由觅食。除此之外,驯鹿在鄂温克人的价值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无论萨满跳神仪式,还是葬礼仪式都少不了驯鹿,驯鹿被看成是连接人和神的使者。每一家每一户都要指定一头驯鹿负责专门运送“玛鲁神”,被指定的鹿被视为神鹿。特别是妇女和驯鹿朝夕相处,有着很深的感情。虽然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今天,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经济价值来衡量驯鹿的价值。历史上,驯鹿是他们最主要的搬运、移动工具,从离开营地到很远的猎场,再向营地搬运大型的猎物,可以说没有驯鹿几

鄂温克的先祖曾居于俄罗斯勒拿河及拉玛湖附近的高山上,后来迁移到大兴安岭的山林中。

乎是不可能的。今天,对于经常处在移动状态的他们来说,搬运帐篷、家具,运送老人和孩子等,驯鹿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这不仅因为驯鹿作为“林海之舟”是他们惟一的畜力,更因为驯鹿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他们的生活伴侣。

针对这种至今还处于半野生状态的鹿种,科学圈养一直是政府的一个美好想法。早在1977年政府就建立了乡畜牧兽医站,1980年又建立了驯鹿圈饲试验基地,以致力于驯鹿种群的引进和进一步圈养驯化的试验。

在移民之前,有近二十户人家,分4个放鹿点放养着驯鹿。2002年开工建设敖鲁古雅乡新址时,曾建设有标准化的鹿圈48个,每个350平方米。但在生态移民过程中,政府存在认识上的不足,对生态移民的理解过于简单,以至于生态移民建设缺乏科学的论证和理论指导。相关工程中存在着盲目建设标准化鹿圈的失误,这反映了政府在生态移民过程中的盲目性和急躁性。

2005年乡政府特别邀请内蒙古农业大学的科研组深入当地进行调研。科研组解剖了一只驯鹿,并将驯鹿的肠、胃等器官带回实验室进行研究,力图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和开发出适合驯鹿的新饲料。驯鹿饲料是在移民后的2005年才开始研发的,试验和研发一直处在艰难的探索阶段,期望实现舍饲圈养驯鹿和真正实现舍饲圈养驯鹿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建立驯鹿生态保护区

由于适合驯鹿的新饲料还没有研发出来,现阶段圈养驯鹿是不可能的。于是当地政府进而又提出建立自然生态保护区。政府和猎民能形成这样一个共识是经过失败后才认识到的,是他们在实践中进行的新的探索和尝试。

保护野生动物最有效的方法是保护其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壮大驯鹿种群,既是鄂温克猎民的愿望,也是强乡富民的有效途径。因此,乡政府积极建议国家在国有林区划出一定范围,设置围栏,建立驯鹿生态保护区,让驯鹿处于自然的放养状态,由猎民实施放养、管

理。还给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驯鹿一个“家”,真正实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历史上鄂温克人的猎场,即猎区范围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一种权力的划定。猎民十分熟悉周围的自然环境,依赖自然的经济使他们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摸索到了许多与自然共存的经验,如地理、气候和各种动植物习性等知识。他们能够从野兽的足迹、粪便和脱落的兽毛中判断出动物的雌雄、离开的时间及其方位。

驯鹿鄂温克人通过“乌力楞”的形式维持和组织各“千”,比如乌启罗干、亚格鲁其干等等的的生活。当时,狩猎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活动。男人多从事狩猎,猎人活动范围大,所有的山河都有鄂温克猎人的记录,都有猎道。妇女不但要照顾老人和孩子,从事日常杂务,还要管理驯鹿等。

但是今天,从行政体系上看,大兴安岭地区存在着两套机构,即林业部门和地方部门。驯鹿鄂温克人在行政上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地级)根河市(县级)敖鲁古雅乡,而驯鹿的活动范围却遍及满归林业局、阿龙山林业局以及黑龙江省的呼中地区。生态移民是一个综合过程,如何协调林业和地方的“自然资源使用权”问题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即使依法进行保护,也会遇到法律的空白和矛盾,比如《草原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在具体的文件和条款上既有不好解释,也有有待完善的地方。

移民后的新问题,主要是驯鹿放养问题,事实上并没有解决。距离新敖鲁古雅乡最近的驯鹿放牧点,也要80公里,远的要二百多公里。过去在老敖鲁古雅乡放养驯鹿,由于历史上是先有敖鲁古雅乡,后有林业局,民间自觉遵守先来后到的原则,林业部门宽容、包涵猎民在林业管理区域内放养驯鹿。现在移民到一个全新的环境,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如果不能相互配合,不仅会使政府支付很高的协调成本,还将直接影响移民的效果。

(三)枪支的管理

大兴安岭的森林曾经为很多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1996年国家实施“天保工程”,内蒙古

“千”是在……地方居住的人们 的意思。见唐戈《浅析“千”在北方通古斯族群—社会组织分类中的意义》,载《满语研究》2003年第1期。

鄂伦春族猎民主动放下猎枪,大兴安岭的森林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林中动、植物资源得以繁衍生息。但处于个体散放状态的驯鹿,经常会遇到狼害、熊害,而已经将猎枪上交了的鄂温克猎民,不要说遇到狼和熊这样大的野生动物,即使遇到野猪,也不能对付。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很多猎民家庭,能够在放牧点放养驯鹿的人,往往是老年男子和中老年妇女,比如巴拉杰依、达娃等等,他们的生命很容易受到威胁。为此猎民现在积极要求为他们配备枪支,并且已经申请多次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政府代表猎民的利益,也认为有必要为猎民配备枪支,但是,市政府为了安全和管理起见不予支持。乡党委书记不无苦恼地

说:我们也有很多难题。如果驯鹿消失了,被誉为“驯鹿之乡”的敖鲁古雅还有意义吗?这些问题不解决,将直接影响猎民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引导鄂温克族和其他民族等有志青年加入到驯鹿饲养的事业中来,既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化,又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这是政府的责任。

驯鹿鄂温克人走过的路是与国家的政治制度、政策、价值观的变化紧密相连的。他们不是生活在我们之外的世界,而是生活在我们之中。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从生动的现实出发,动态地把握民族文化现象,是我们这些从事鄂温克民族研究的人需要不断探索的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

- [1]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 [2] 赵锦元,李毕达编译.北极地区的驯鹿民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

[责任编辑:唐 戈]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Ecological Immigration of Reindeer Ewenki

QI Hu i jun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ollege, Central National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reindeer Ewenki, living in the Aoluguya Ewenki Nationality Autonomous Township of northeastern forests of the Great Xinganling Mountains, is the only ethnic group feeding reindeer in China. In 2003, the government carried out a policy of ecological immigration and moved them all to settle down in suburb. However, the reindeer often in half-wild state could not accustom to be tamed in fence or house, so the tamer and the animal had to return to the forests and go on the long lasted life. The situation of “setting but not living” made the ecological immigration in a much awkward position. It is a system project to bring about the thoroughly settlement of reindeer Ewenki, the nature feeding of reindeer and the harmony of man and animal, man and nature,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issue for us to stud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orities' area.

Key words: Aoluguya; reindeer Ewenki; ecological immigration